《活计档》暴露清宫秘史

(日本)杨启樵

The "Huo Ji Dang" contains the original records of all work undertaken by the Construction Office of the Yang Xin Dian, which exclusively served the imperial family in the Qing Court. Drawing on these long-overlooked,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activities of the Qianlong and Yongzhong emperors and analyzes their temperaments, their interests, and conduct.

一、乏人注意的史料——活计档

近年来有关雍正史料的整理或梓行,数量的确相当庞大,例如《宫中档》、《军机档》、《起居注》等等都是。然而对于某些问题,比方说,雍正继位、暴亡以及私生活等,都语焉不详,解决不了多大疑问。我以为继位和暴亡两事,包括拙作在内的各种推断,已做到了尽头,极难推出新论;除非有新史料出现,不然暂时可以休矣。但是,雍正的私生活方面,却有补充余地。不言而喻,这不能求诸官书;即使上述故宫秘档中,虽略有涉及,但为数不多。以《起居注》来说,应该详记帝王行动,二十年前,笔者抱着无限希望,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借阅残缺的那部分,一读之下却令人泄气,因为内容并不比《实录》等官书详细多少。后来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借阅另半部《起居注》,结果仍然相同;原是同一部书,自然不会有差异。还有一种《内起居注》,记载皇帝个人生活,按说该比其他史料细密、详尽,可惜未曾寓目;不过,从上述史料来推论,对它期望不高,因为像雍正那样的雄猜之主,不可能让记注之臣,闯进他的私生活,揭开隐秘。所以,虽说是记载"起居",实际上看不到半点私生活真相。

一本正经的文献中付诸阙如,却偶尔会在乏人注意的史乘中找到一鳞半爪,北京一史馆藏有养心殿造办处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便是其中的一种。所谓"作",是指宫廷中专为皇室服务的工作场所,有裱作、珐琅作、镶嵌作、杂活作等。《活计档》是工程记录:详尽记载皇帝何月何日下谕,制作或修补何物,采用何种材料,作成何种形式,由何人操工,何月何日竣工,由何人携至何处,如何安放等。这原是枯燥无味的流水帐,却能从中窥见皇帝的好尚,显示出他的性格、作为,还可以订正、补充史实,因此逐一提出来评论。

二、书画文物有赝鼎

众所周知,清宫中一些匾额、楹联多出于帝王之手;且其中不少可以道出执管者之名。以养心殿来说,中央的"中正仁和",西暖阁的"敬天法祖"、"勤政亲贤"匾,以及"惟以一人治天下,

岂为天下奉一人"挂联，无不知乃雍正亲书，然而《活计档》却有不同记载，透露出此副挂联，于乾隆朝已调包，时在二年十二月，档云："初九日，首领郑爱贵、夏安交御笔'勤政亲贤'匾一面，'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对一副。传旨：着将御笔匾对，配做楠木边杉木壁子匾一面、挂对一副，……俱托纸。"①世人一向以为此联出自唐代张蕴古《大宝箴》，雍正改两字，躬自书成。《活计档》中有记载："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怡亲王交御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对一副，……"②。读此始知现今悬挂在养心殿一联，已非雍正手笔。其实宫廷中匾、联的更换，乃常有之事，并非乾隆别有用心。雍正自己也屡有更易，如三年(1725)八月二十六日，传旨："俟朕往圆明园去后，将养心殿旧'中正仁和'匾取下，换上新'中正仁和'匾。"③又有一次，他觉得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上"现挂的对联，钩的不好"，另写一幅，"着将此对，照'正大光明'殿上对样，做成换上。"④

清宫中珍藏的书画、器皿，自属天壤异宝，其中钤有"御览"等印章，兼有题跋、落款者可信度当更高，但也有疑问；实际上制作年代、作者等大有文章。这也是读《活计档》才发现，且举例说明。有一次，乾隆让御用画人唐岱绘画，挂于安佑宫。但最后竟有那么一句："落雍正年款"。⑤这岂非奇怪，明明是乾隆朝作品，为何要用前代年号？此条还不打紧，还有一条更荒唐，乾隆一登极，于元年(1736)四月十五日传旨："所交玛瑙、器皿等件，有款不必动；无款俱刻乾隆年制款。"⑥这比上一条严重得多，因为除非乾隆故意制造赝鼎，提高身价，类此'落雍正年款"异举当不多。且雍正朝制品，按理说都该有年代，《活计档》中记他肇基后下令："(元年四月十二日)郎中保德奉旨：嗣后凡所做之物件，有可以刻得年号者即刻年号。"⑦这里显示出两个意思：一是雍正朝制作，大部分年代分明。二是雍正朝以前的，很可能年代甚至于作者姓氏多有脱漏，颇难稽查。《活计档》雍正三年(1725)有如此一条："太监杜寿交兰花绢画一张，传旨：'查此画是何人画的，即将画画人的名字写在此画上。'"其后查明是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作品。⑧郎氏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即供职内庭，但终康熙朝，竟连一幅画也没有，直至雍正继位，方有他的作品出现。也许他此前不受重视，但康熙不注重落款、年号的可能性也颇大，才有暧昧不清的制品。

我说他严重，因为乾隆以前的珍品，假若缺乏年代，须一律加上本朝年号，如此顺、康朝的，或者更早的明代产品，都变成乾隆朝的，使后世的美术研究家、鉴赏家扑朔迷离，何从鉴定。譬如说某件珍玩，自它材料、形制、风格、手法等鉴察，应是明代作品，但钤有确凿可信的"乾隆"年号，那该如何判断？

然而宫廷中某些艺术品的作者等，不可看得太认真，有些绘画乃出于众人之手，这在《活计档》中都有记载，泰半发生在乾隆时代，且举几条为例，元年(1736)十一月十五日，皇帝让宫廷画家唐岱、郎世宁、陈枚三人商酌，画岁朝图一幅。⑨二年(1737)元月五月，又命三人合画元节大画。⑩有时，皇帝还指明合画细节，如七年(1742)八月十七日，命郎中海望传旨："清宴东暖阁贴的'玉堂富贵'横披上，玉兰花、石头甚不好，尔着郎世宁画花卉，唐岱画石头一张，换上。"⑪又如四年(1739)五月十五日，皇帝令画菊花横披，指定："花卉着吴璋画，石头着陈善画。"⑫有时命人润饰，如大臣高其佩擅长丹青，曾在雍正朝画山水绢画一幅，乾隆不惬意，评道："此画景致好，中间山不好。着唐岱、朗世宁改画。"⑬此外，书画的临摹也有，如乾隆三年(1738)，传旨："着西洋人张纯一，照冷枚'相马图'画一张。"⑭还有皇帝御笔，很不可靠，因有幕后捉刀者，以雍正来说，他精于书法，而且写得不少，但偶尔也令人代书，有一次制造珐琅葫芦，有旨："葫芦上字，照朕御笔，着戴临写。"⑮

通过《活计档》，可知故宫收藏的字画、器皿，即使有钤印、题跋，也不可轻信其时代和作者。

三、雍正讲究享受

二十年余前，我开始研究雍正史，觉得雍正这个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不象乃父康熙或嗣子乾隆那样：江南游山玩水，木兰围场狩猎，而是日夜忙于御门听政，接见群僚，披阅章奏。余暇不过与缁黄辈讨论性宗、道术而已。而节俭是他的美德，自称秉性不喜华靡，臣下进献仪物，禁华丽精巧，文告中一再表示出这种撙节的意志，如雍正五年(1727)，谕内阁："朕又闻各省督抚，因朕今年五十万寿，欲购觅玩好之物，以为进献者，此举尤为不可。"[16]又如六年(1728)，谕内阁："各省督抚，……倘或仍有进献古玩者，则并其方物、土仪亦行摈弃。"[17]宠臣张廷玉也如此描述："世宗宪皇帝时，廷玉日值内廷。上进膳，常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饼屑，未尝废置纤毫。每见臣工，必以珍惜五谷、暴殄天物为戒"。[18]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他过着异常奢侈的生活，起居、穿着十分讲究；表里不一，是绝大多数帝王共同现象。但仅看表面文章，会被蒙蔽；笔者在过去的著作中，也曾盛道他节约美德，引《实录》说：

(帝)谕大学士等：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则献者日多，大非朕意。著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毋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息矣。[19]

以后我觉得这条史料有问题，不能用来证明雍正的撙省，因这道谕旨颁发于十二年(1734)四月，而读《活计档》，早有他爱用象牙用具的记录，如三年(1725)，年希尧进象牙四根，重二百二十九斤。[20]又如五年(1727)下谕：于圆明园勤政殿后大方亭中，做一黑漆床，尺寸按照先前交下的象牙席。[21]又如六年(1728)，圆明园太监交来"象牙边象牙席靠背二分，象牙席黄缎边褥子四个"，令供于寿皇殿及恩佑寺。[22]类此谕旨还有，不一一例举。由此可见禁止上贡，并不表示不喜爱。《实录》乃官书，容有修饰的地方，我旧著里也引用朱批谕旨，来证明雍正的节俭，说他频频告诫臣工，节省纸张：

可惜封套，何必一折一封；折页若薄，便三四折一封何妨。[23]

可惜绫子，向后除面套，折身用黄色纸好。[24]

再奏事之折，可用素纸好。可惜绫绢，请安折犹可。尔通知满保一体实行。[25]

实际上这一套仍是门面话，只是警戒官僚，不可奢靡、浮华。年前，冯尔康先生等编著的《雍正皇帝全传》中也引用过第三条，论道："他在一些臣子的奏折上特别批示，应是真心话了。""折子面用的绫绢很有限，他从爱惜物力上讲，也注意节约。"[26]

其实我们都为雍正瞒混，他在用品上极其讲究，就以奏折、封套来说，也十分注重，读《活计档》可知端详，且举数例，七年(1729)正月，太监持出黄绫封套一件，传旨命"作"照样做四件。[27]有时具体说明形式，如五年(1727)十一月，太监持出封套一个，传旨照样做三个，"其封套上只写'陕西总督岳钟琪'七字。其前面跪封等字不必写，背后的字亦不必写。以后再做时俟交出样来再做。"[28]臣工的封套要特制，每次只做几个，下次则"俟交出样来再做。"且不限于岳钟琪，其他例子还有；不限于封套，折纸也须特制，《活计档》中有如此叙述：

(七年正月初五日)太监张玉柱、常贵传旨："着做黄纸折一件，长六寸，宽三寸，十八页纸。不要太滑了，亦不可表厚，用黑铅界烫。其折子壳面用碎花好黄锦糊表，上贴黄绢描泥金签。再做一外套，亦糊黄锦，贴黄绢描泥金签，钦此。"

紧接此段文字后有数行小字，记载奉旨后的工作步骤：

于本日，太监范国用持出长七寸一分，宽三寸一分五厘，界红烫七烫折片一件，说太监张玉柱、王常贵，传界黑铅烫，照此红烫样式界。记此。于本日照尺寸做得糊黄鸟锦套、贴黄绢描泥金签、黄鸟锦壳、面贴黄绢黄泥金签、界黑铅烫、十八页折一件，郎中海望呈进讫。[29]

我这样不惮其烦地引用史料，目的仅想说明一点：雍正朱批中要臣工节省纸张，只是片面的、表面的，并非真意；实际上刻意求工，所费不赀。然而这只是他阔绰手法的一端，与他在其他方面的讲究，实在微不足道，关于这些，另有文章，此处不再饶舌。

四、乾隆幼名及雍正杀子

乾隆名弘历，还有几个别号：长春居士、信天主人、古稀天子及十全老人。这是人所皆知的。然则，他是否一开始便取名弘历，或者另有幼名，二百余年来从未有人道及，就是年来出版的几部大型的乾隆传记，也未提起。但是通过《活计档》，却能觅到些头绪。请先阅读下列两条："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管太监张起麟传旨：三阿哥、元寿阿哥、天申阿哥、六十阿哥所用的鞓带、软带，向养心殿造办处要。"[30]次日又传旨："太监刘进忠、汪文光谨奏：元寿、天申阿哥讨数珠二盘等因具奏。奉旨准做。"[31]

三阿哥乃乾隆三兄弘时，一无疑问，至于元寿当是乾隆幼名，天申名是皇五子弘昼，六十阿哥疑是皇九子福惠。然而元寿、天申名仅见于此，以后均以四阿哥、五阿哥相称；可能就在同年稍后，以排行代替幼名，不再使用，这可见上举两条的可贵。

《活计档》中也约略显出了所谓"密建皇储"的端绪。先交代一下雍正诸子情况，他共生十子，除了早殇晚生之外，即位时，有四子，那就是二十岁的弘时，十三岁的弘历，同年小三个月的的弘昼和年仅三龄的福惠。弘时虽排行第三，但兄长们早夭，他实际上成了长子，却不为乃父所喜，《清皇室四谱》中说："皇三子弘时，……雍正五年丁未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年二十四。十三年一月，高宗即位，追复宗籍。"[32]

雍正御极后才九个月，立即选定继承人，却不公开，而亲书密旨，黄纸固封，贮于锦匣内，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究竟密封中嗣贰属谁？当今学者一致以为是弘历，日后他果真成了乾隆皇帝。事情似乎很简单，可是想深一层，却不那么单纯，我们要问：雍正密建皇储的用意何在？那是预先选定继承人，万一自己有不测，皇位不至于悬空；一方面鉴于康熙立太子的弊病，绝对不能让影响君权的对抗势力出现，易言之，包括继承人在内，无人知晓锦匣中秘密；倘若尽人皆知，也就失去了秘密立储的意义。因此，雍正初年，皇帝故布疑阵，让人相信四阿哥、五阿哥都有继位可能。然则如何对待弘时呢？他罹罪已在雍正五年(1727)，按理说，当时也是继承者之一，不过据史料来看，因为失欢于父皇，他的希望微之又微。但这里有一点须要澄清，学者们据《清皇室四谱》，来推断他的死因：乃是不满父皇的骨肉残杀。孟森先生说："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盖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均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33]金承艺先生更认为弘时之死，当是被诛戮，或赐令自尽。[34]我不同意。关于这点，杨珍女士在《雍正杀子辨疑》文中已辨明，指出雍正虽削弘时宗籍，却未处死，他是在"忧伤、郁闷中病死。"[35]

我觉得言之有理，杀子云云不可信。可有两点和杨论稍有出入，其一，杨文与一般学者相同，认为弘时的遭遇，是他支持乃父政敌的缘故。我以为并无实据，可能和康熙废太子允礽相

似，因行为极度不检而罹罪。这需要一些笔墨，因和本文无大关系，姑且不论。其二，杨文说，弘时父子之间早有隔阂，进一步加深是在元年底，因为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周年忌辰，雍正遣往代祭的却是皇四子弘历。翌年“再期祭辰”，派往景陵祭祀的，仍然是弘历，“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希冀，已完全破灭，……。”[37]

对于这个，我也有两点意见，第一，弘时父子间感情破裂，其来已久，应该远在康熙时代。而且已经表面化，这也可从《活计档》中窥见，因雍正元年(1723)的赐赏记载中，弘时名仅出现于上记一条；其实这条算不得是恩赏，只是说皇子的腰带，向养心殿索取而已。然而四、五两皇子却屡有赏赉，如：

元年(1723)十月二十七日：“着赏给四阿哥、五阿哥、六十阿哥每人暖砚一方。”[37]

元年(1723)四月十二日：“总管太监张起麟，交四阿哥玉图书一方(小字注：上书“勤学好问”)，水晶图书一方(上书“存诚主敬”)，寿山石图书三方(一方上书“乐善堂”，一方上书“聿修厥德”，一方“永言配命”)。说怡亲王谕：俱照原书字样篆书镌刻，配匣盛装。”“(同日总管太监张起麟)交五阿哥寿山石图书六方(上书“中正仁义”“温良恭俭”“进德修业”“日就月将”“稽古斋”“为善最乐”)。说怡亲王谕，俱照字样镌刻，配匣盛装”。[38]

因此，不须等待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弘时早知问鼎无望；而雍正也不掩饰对他的冷淡而厚遇四、五阿哥，这在平日赏赐中，已表露无余。另一方面，四、五两子的待遇，尽量保持平衡，使人难以推测何人简在帝心；这也可从赐赉中见到，譬如雍正三年(1725)正月，赐四、五阿哥鞓带、软带各两副，[39]同年八月，赐二人数珠各一，[40]看起来不分轩轾。又上引赐图书时，弘历五方，五弟弘昼反而有六方。而所刻文字，也难看出有所高低。总之，在恩赐中，雍正尽可能做到公平，没有厚此薄彼的表示。

后人往往以结果来判断，譬如以乾隆与他的五弟弘昼比，要强得多，自然雍正秘密建储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乾隆。因为不用说文采、武功，乾隆高高在上，即使以寿考来看，乾隆享寿八十有八，而弘昼只活了五十七年。然而这是以后才知道的，立储的时候不可能预测。

尚有一说：康熙原不垂青雍正，因钟爱孙乾隆，始立其父，这是无根之谈。初见于朝鲜史料：“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吾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41]国人信此说者不多，其后日本稻叶君山加以阐扬：“康熙帝始无立雍正之意，彼由其爱宝亲王(乾隆)，其父雍亲王乃得以即位，此说不无可信。”[42]官书中的确有康熙祖孙相爱的一段记载，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乾隆初谒乃祖于圆明园，康熙一见钟爱，命抚育宫中，亲自课读。是秋，乾隆随祖行猎木兰围场，为熊袭击，幸康熙用御枪殪毙，回帐后对皇贵太妃说：“是命贵重，福将过予！”[43]前数年，读到钱宗范先生的《康乾盛世三皇帝》中的一则，作进一步阐述：

> 从现有史料来看，可能康熙到六十一年三月以前，还没有最后确定其皇位继承人，但在六十一年三月，当胤禛带其十二岁的爱子弘历(乾隆帝)，到圆明园的镂月开云殿拜见康熙时，康熙对弘历一见钟情，宠爱异常，把自己毕生事业的希望，寄托在爱孙弘历身上。这件事成为康熙最终确定传位于弘历之父胤禛的决定性因素。[44]

此论似臆测过多，颇难接受。乾隆如何如何受乃祖偏爱，不免有过誉之词，要大打折扣。其实对于其他孙儿，这位祖父未尝不如此，废太子第二子弘皙即是其中的一个，康熙感情深挚，十分重视家庭关系，晚年宠爱儿孙，是人情之常，与继统无关。假如雍正不暴亡，象乾隆那样活到八十八，那么在位便有四十三年之久，乾隆纵能接班，也已五十五岁。这五十五年的皇子生

涯中，自有种种变化：父子相争，兄弟阋墙，康熙年间的悲剧难保不会再一次重现。雍正在位仅短短的十三载，康熙事先怎会料到？所以，因乾隆而立雍正之说，绝不可信。

更进一步说，雍正元年(1723)八月的密建皇储，继统者是否乾隆，不得而知；即使是他，也随时可更换。纵然雍正一意选定乾隆，正如前面所说，他必须多方掩饰，让臣僚们无从知道谁是真太子。所以在各方面，都使四、五阿哥分庭抗礼，《活计档》中赏赐的平分秋色，可见一斑。

五、雍正死于丹药?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雍正暴死之谜》的文章，推测他可能死于服食道士的丹药。然而宫内有关羽士活动的资料不算多，这次在《活计档》中发现了若干条，可以补前文的不足。雍正的宗教观相当复杂，他主张三教同原论：作为天子，自然要搬出儒家那套经天纬地的宏论。而早在藩邸时，常与僧衲往来，讲论佛道，刻有《御选语录》，于佛门外插入一道流紫阳真人；宫中蓄养着九流十教的帮闲客，其中便有道士。这在康熙朝已有；圣祖虽说"朕亦有用喇嘛、和尚、道士处，并不令伊等占验。"[45]其实颇有任用方士、锻炼丹药的记载。[46]雍正的御制诗集内，有几首涉及修玄，如：《采苓》、《放鹤》、《授法》、《烧丹》等。[47]他称赏紫阳真人，说真人的《悟真篇》，能发明金丹之要，"若真人者可谓佛仙一贯矣。"[48]他暴亡后的第三天，嗣主乾隆立即降旨，驱逐宫中道士，既承认雍正万机余暇作炉火修炼，却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49]实是欲盖弥彰。

虽然雍正信道之举确凿，可缺乏真实记录，如今，《活计档》中的描写，大有助于了解真相。以下举例说明。宫掖中礼拜如何？《活计档》雍正九年(1731)条录皇帝语："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又谕：后面位育斋两次间给法官办法事、暂坐。玉翠亭东添盖小房几间，给法官居住。[50]所谓法官就是道士。还有说得更清楚的，雍正八年(1730)十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乾清宫月台上新盖黄毡板房后，着做斗坛一座。"次日，做成小样(模型)呈览，雍正不满意，说："此样做法不是。尔在月台上板房一间，将呈过样的拆卸，斗坛搭在此板房内，周围俱要走得人则可。斗坛内做一插屏，上身高三尺三寸，宽二尺四寸，满扫天青。中间做一径圆四寸玻璃镜，左边一玻璃红日，右边挂一玻璃白月，俱径一寸二三分，下画流云，上画祥光，暂供用。嗣后再做一九龙边扫金座，上身插屏用白檀，满扫天青。其镜日月照此样做。另画样呈览。"[51]

月余后的十一月初一日，将修改后的小样一座，画样两张上呈，雍正仍不惬意，批评说：样是照样了，可是"斗坛内牌位画样中间，元光太高，日月太低。(应)将日月画在元光上，祥光到顶，用云穿插，半掩半露。"[52]你看他何等认真、仔细、虔诚。

前文说过，雍正的宗教观系佛道杂揉，然则礼拜如何？似乎也是神佛不分，因为很多史料有这样的表示。如上引一段，十月二十七日传旨：乾清宫月台上板房后做斗坛，翌日上呈时也说斗坛，但十一月初一日修改后进览时却道："做得乾清宫月台上板房佛龛"小样呈览，奇怪的是皇帝看后，依然说斗坛如何如何。不宁唯是，上引位育斋次间备法官用，而斋中间则"仍供佛"。他处还有这样一条："朕到圆明园，在深柳读书堂住。但佛楼斗坛太远，……。"[53]这也可证明神佛礼拜是杂揉的。

斗坛原乃道士礼神之处，可雍正也躬自祈祷，《活计档》记："(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奉旨：'佛楼地坛内神像，朕礼拜时前面太露，尔用牛油石，做抹角长方盆，……盆内配珊瑚树，嵌紫英

石。'"[54]正因为皇帝须亲自礼拜，当他居住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时，便觉得“佛楼斗坛太远”，就在堂后添设行龛斗坛。[55]此前，仅设于大内，赴圆明园时，将“乾清宫月台上供的斗坛行龛牌位”，“随佛请至圆明园”。[56]

由于礼神，便须要频频制造衣冠，十年(1732)，持出红缎道衣一件，传旨“着交苏州织造，照样做刻丝法衣十件，红缎道衣五十件。”[57]有时，式样非常考究，如：“绣金龙法衣、绣仙鹤法衣。”[58]这可能是皇帝穿着的。道冠的名堂也不一而足，如：“象牙填巴尔撒木香道冠”、“密蜡道冠”、“龙绸珀道冠”、“象牙镶嵌五岳图道冠”、“莲花式九曜星官道冠”、“玳瑁道冠”等等。[59]制作不精，就会勒令改做，如：“刖珊瑚五龙道冠上的巴达马不好，另改做。”[60]

方士与炼丹有不解之缘，宫中烧炼的情况如何？关于这个，雍正并不讳言，《烧丹》诗道：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61]

这是宫内活生生的炼丹写实图，无可否认。《活计档》中也有此类记载，如六年(1728)十二月十九日，太监张玉柱、王常贵交来银砂、铅底，传旨：“着烧炼试看。”[62]又如十二年(1734)二月二十二日，内大臣海望奉旨：“年希尧进的汞金炉，是何料炼成？”海望随奏，称有带来制方，内开水银胆矾烧炼等语。[63]

烧炼也可能是营利的黄金，但这里应该是指硫化汞的丹砂，经加工后制成丹药服食。烧炼的场所可能是圆明园的南熏殿、六所，因为自雍正十年(1732)始，那里有大量使用煤的纪录，可以排出下面的一个表。

年	月	日	场　　所	品　名	数　量
一〇	一	三	南熏殿	炸子煤	二千斤
一〇	一	六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〇	一	一〇	同上	同上	五千斤
一〇	一	一一	同上	红铜条	二斤
一〇	一	二〇	同上	炸子煤	一万斤
一〇	一	二六	同上	白炭	一千斤
一〇	一	二八	同上	红铜条	三斤
一〇	二	二	同上	炸子煤	三千斤
一〇	二	五	同上	同上	一万斤
一〇	二	一一	同上	白炭	二百斤
一〇	二	一八	同上	炸子煤	三千斤
一〇	二	二二	同上	同上	一万斤
一〇	三	八	圆明园六所	同上	二万斤
一〇	三	八	圆明园接秀山房	同上	五千斤
一〇	四	四	圆明园六所	同上	同上

年	月	日	场　　所	品　名	数　量
一〇	四	一四	同上	红铜条	一斤
一〇	五	二二	同上	炸子煤	二万斤
一〇	闰五	五	同上	同上	二千斤
一〇	六	一四	同上	同上	二万斤
一〇	六	一六	同上	同上	二万斤
一〇	七	七	圆明园接秀山房	同上	三千斤
一〇	七	七	同上	白炭	五百斤
一〇	八	二	同上	炸子煤	二千斤
一〇	八	七	圆明园四所	同上	三千斤
一〇	八	二一	圆明园头所	同上	四万斤
一〇	九	六	圆明园接秀山房	炸子煤	三千斤
一〇	九	一二	圆明园四所	同上	五千斤
一〇	一一	一一	圆明园接秀山房	同上	一万斤
一〇	一二	六	圆明园四所	矿银	三百两
一〇	一二	九	同上	白炭	一千斤
一〇	一二	一七	同上	红铜条	二十斤
一一	五	二七	圆明园头所	炸子煤	二万斤
一一	八	四	同上	同上	二万斤
一一	九	三〇	同上	同上	三万斤
一一	一〇	一五	圆明园深柳读书堂	矿银	八〇两
一一	一一	一一	同上	同上	二百两
一一	一一	一一	同上	炸子煤	二万斤

丹药须要盛装的瓶，雍正十二年(1734)，可能是宫内炼丹最盛的时期，《活计档》中不时有药瓶的纪录，如正月二十七日，传旨：将盛一千丸药的各色玻璃瓶做五六件。[64]又如二月十一日，传旨：将盛五十丸药玻璃瓶送进一件来。[65]又如二月十七日，传旨：将盛一百丸药五十丸药玻璃瓶送几件来。[66]又如二月十八日，传旨：将盛药玻璃瓶送进一件来。[67]又如传旨：将盛药玻璃瓶送进六件来。[68]又如四月十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来说，太监梁文传旨：将盛药小些玻璃瓶送进几件来。[69]

以上炼丹、用煤、索瓶的记载，也许可以给二十年前的拙作《雍正暴死之谜》补上一笔。不

过，圆明园六所，曾经作为玻璃作坊，煤炭未必不能用于此途，以此断定修炼丹药，也是偏颇不全，该审慎采用。

《活计档》是工作记录册，一向不为人注意，然而内中却隐藏着若干珍贵的史料，如果在故纸堆中努力发掘，或许有莫大的发现，也未可定。（按：此文系接受姬路獨協大学特别研究助成费撰成。）

---

①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第三三七九号，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九日。（以下简称〈活计档〉三三七九，乾隆二一一二一九。）

②同上三二八八，雍正一一一一二二。

③同上三二九五，雍正三一八一二六。

④同上三三二六，雍正七一七一七；同上三二九五，雍正三一七一三〇。

⑤同上三四〇三，乾隆八一七一二。

⑥同上三三七六，乾隆一一四一一五。

⑦同上三二九一，雍正一一四一一二。

⑧杨启樵：《艺术大家郎世宁新考》，页一〇五，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四六卷，一九八七年二月。

⑨《活计档》三三七六，乾隆一一一一一一五。

⑩同上三三七八，乾隆二一一一一五。

⑪同上三三二六，乾隆七一八一一七。

⑫同上三三〇二，乾隆四一五一一五。

⑬同上三三七六，乾隆一一一一一四。

⑭同上三五五六，乾隆三一四一二〇。

⑮同上三三四二，雍正九一一〇一二〇。

⑯《清世宗实录》卷五五，雍正五年闰三月乙酉。

⑰同上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己酉。

⑱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一，页十五。

⑲《清世宗实录》卷一四二，雍正二十年四月庚午。

⑳《活计档》三二九三，雍正三一四一一四。

㉑同上三三一〇，雍正五一七一一八。

㉒同上三三一七，雍正六一五一五。

㉓宫中档朱批奏折原件一五二九〇号，赏赉五一四一一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㉔《宫中雍正朝奏折》第四辑，页四三〇，法海三一五一二八，一九七八年，台北故宫博物院。

㉕同上页四七一，黄国材三一六一三。

㉖冯尔康等主编：《雍正皇帝全传》页三四〇，一九九四年十月，北京，学苑出版社。

㉗《活计档》三三二六，雍正七一一一一六。

㉘同上三三〇六，雍正五一五一一一九。

㉙同上三三二六，雍正七一一一五。

㉚同上三二八七，雍正一一二一二三。

㉛同上，雍正一一二一二四。此处虽未明言元寿系谁，但从语气上推测，无疑指乾隆。又六十阿哥为何人？待考。

㉜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三。

㉝孟森：《海宁陈家》页五一五、五一六，收孟著《清代史》中，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台北中正书局版。

㉞金承艺：《关于清世宗皇三子弘时——看一代帝王家的悲剧》，一九八〇年，台北《故宫季刊》第十五卷第二

期。
㉟㊱杨珍:《雍正杀子辨疑》,《清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三期。
㊲《活计档》三二八七,雍正一一一〇一二七。
㊳同上三二九一,雍正一一四一一二。
㊴同上三二九四,雍正三一一一一三。
㊵同上三二九三,雍正三一八一一八。
㊶朝鲜《景宗实录》二年十二月戊辰。
㊷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四八章十三页,一九六〇年九月,台湾中华书局版。
㊸《清高宗实录》卷首;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㊹钱宗范:《康乾盛世三皇帝》页二一三,一九九二年八月,广西教育出版社。
㊺《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七,康熙四八年三月丙辰。
㊻《清稗类钞》方伎类。
㊼61《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七,收于《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类六。
㊽同上卷十七。
㊾《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㊿《活计档》三三三八,雍正九一一一二七。
51 52同上三三三三,雍正八一一〇一二七。
53 55同上三三三八,雍正九一一一二七。
54同上三三六二,雍正十二一四一三。
56同上三三四〇,雍正九一九一十九。
57 58同上三三四五,雍正一〇一一〇一二三。
59同上三三四四,雍正一〇一二一一六;三三五八,一一一四一七。
60同上三三四四,雍正一〇一二一一六。
62同上三三一二,雍正六一一二一一九。
63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 一二二。
64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一一二七。
65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二一一一。
66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二一一七。
67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二一一八。
68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三一二二。
69同上三三六二,雍正一二一四一一〇。